

長沙文史資料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長沙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主編

增刊

1990 6

庚戌长沙“抢米”风潮资料汇编

《长沙文史资料》增刊

NH254/2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

1990年6月

长 沙 文 史 资 料

增 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
(内部发行)

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大32开本 字数：135,000

印数：2000 定价：2.20元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前 言

1910年发生在长沙的“抢米”风潮是一场自发的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是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预演，曾给予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因而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对于这场斗争的起因、动力、会党的作用与风潮中官绅争斗的影响等，人们还不是很明确的，有的认为它是一次单纯的“饥民”暴动；有的则认为，暴动“实系乱党居多，兼有外匪勾煽，并非饥民。①”也有的认为“其徒多匠作”，“市民听驱使”②，即泥木工人居多数；还有的甚至认为，“暴动完全是绅士阴谋的结果”③。笔者通过搜集整理十多万字的资料，对上述问题作如下探讨。

一

归根到底，长沙“抢米”风潮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共同压迫的结果。那时，即使在正常年景下，农民的生活业已难乎为继，一遇灾荒，则无以为生。1909年夏，滨湖一带“淫雨兼旬”，“堤垸十溃八九”，“南洲、华容、武陵、龙阳、沅江各厅县间堤，亦多漫溃，田禾概遭淹没”，“统计各处灾民不下百余万人”④。华容本是鱼米之乡，但到1910年春，“米价升值八十余或九十余及百余文不等，且皆有价无米。”“剥树皮、掘菜根、摸蚌拾蛤以疗残饥者，不下数万家。”⑤南县全境皆垸田，垸堤溃决之后，一片汪洋，灾民无处安生，只好巢居在大树上，但住久了以后，纷纷坠

落下水，“宛如秋叶凋零”，“死亡相继，卧病呻吟，几乎比比皆是。”⑥安乡共有590余垧，仅存者只有30多垧，灾民“屋舍已漂，鸡犬已尽，惊涛骇浪中，攀枝浮木以延残喘者所在皆是。”水退之后，“道路颠连，或咀菜和根，或糊糠作饼，此履木叶，彼食泥丸，悲惨之情，笔不能绘。”⑦澧县是重灾区，灾民“扶老携幼，男号女啼，遍野沿门，鸠形鹄面，食树皮、草根、观音土及糟糠而毙者，所在皆是，大都身无完肤，一息尚存者割以充饥。”⑧堤破之后，“势如山崩地裂，于是庐宅荡析，人民漂溺，田畴刮削，邱墓掘发；其尤惨者，汪洋一片，尸肿遍浮，或至流入民户，积填壑中，甚或挂悬林间，漂搁岸上，然鱼鸟争食，哀不忍睹，幸而得保余生，或抱树杪，或蹲屋脊，然不为溺鬼，终不能不流为饿鬼。”⑨甚而至于还出现了“生人相食，如董杉、福兴窑等处，或杀同伴，或杀己孩，或易子相食。”⑩除严重的水灾外，“高原州县又雨旸不时，半遭虫旱。”⑪这些遭受水、旱、虫灾的灾民纷纷逃往长沙乞食；湖北公安等县的灾民也有不少逃来长沙，致使长沙饥民陡增。地主豪绅则囤积居奇，“叶德辉兄弟四房留租谷万石”⑫；湘抚岑春煊则伙同帝国主义各洋行偷运粮食出境。据有人统计，2月份公私存谷“不满三十万石”，当时省城城厢内外每天需要食谷“六千石”，每“月须谷十八万石”，“即颗粒不复外溢，不足两月之食。”粮食奇缺，引起粮价暴涨。“湘省从来米价每石恒二三千文上下，光绪三十二年水灾，亦不过四千余文。今尚未播种，价已七千以外，实为百数年所未见。”⑬乃至出现早、晚市价不同，甚至有价无米，“有竟日携钱而无处购米者。”⑭于是，群情激愤，“几有不可终日之势”。长沙本地的居民已是嗷嗷待哺，外地涌来的饥民更无食可乞。在长沙街道上，“老弱者横卧于巷，风吹雨淋冻饿以死者每日数十人。”“妇女无处行乞，母子相抱而泣，或将三、五岁小孩忍心抛弃，幼孩饿极，便取街道

粪渣食之。”^⑮数以万计的饥民求生不能，只得挺而走险。毫无疑问，饥民是这次暴动的诱发力量，也是暴动初起时的一支主力军。

二

长沙自1904年开埠以来，日、英、美、德等国根据《长沙通商口岸租地章程》，在长沙城北门、西门外一带开设了大量的洋行和企业、公司，据不完全统计，迄至1910年底止，达45所之多。其中日本占35所。日本洋行有：三井、大仓、三本、三合、盐川、大石、小岑、中村、斋城、奥村、黑濑、中岛、东信、大冈、上野、古川、柴田、日丰、日信、小村、天华，还有杏林堂药房、广贯堂药房、博仁堂牙科医院、日本长沙医院、同仁医院、美乃和料理店、石井照相馆、日本金银组合店、陶山照相馆、日本株式会社、日清公司、日本邮便局、日本银行、日本海军俱乐部等。英国在长沙设有太古、怡和、亚细亚等洋行，还有英、美烟草公司和怡和烟草公司。美国有美孚、德士古等洋行，还有花旗银行。德国有开利、西门子等洋行。^⑯各帝国主义国家沿引“利益均沾”的原则，蜂涌而至，把长沙城变成了掠夺湖南人民的据点，他们在此大兴土木、设工程局、修马路、盖洋行、筑码头、立堆栈，还公然开设赌场、鸦片烟馆、妓女院。各帝国主义分子通过开设洋行、企业、公司，排挤湖南原有的民族工商业，“外国洋行，特别是日本洋行一开，西门外的本地铺子便倒不赢，”“只一两年，长沙的店铺，便一片倒声。西门外百多家做粮食、布匹、百货的铺子，光是大铺子就倒了十几家。象泰昌南货店，原先生意极好，日本洋行一开，也倒了。大批店员、工人、相继失业。”^⑰清末，按照湖南农村的习俗，家中子弟多的，总要送一两人到省城学艺，而手艺人中泥木工占多数，在正常年景下他们已很难找到工作，随着各帝国主义洋行、企业、公

司、教堂、领事馆等洋式建筑的大量修建，大都由洋匠或从汉口、广州、上海等地雇请有盖造洋房经验的工人来承担，湖南本地的泥木工匠完全失去了生计，日子难熬，“往往就指望‘善人’施舍”。他们对此十分不满，1908年末，泥工们把一家大丝绸店的一堵土墙，制成精美的泥塑艺术品：一个外国人背着贡品到中国来，领着一个裸体齐腰的外国女郎。英国驻长领事休特勒认为这是对他的讥讽，对这幅泥塑艺术品提出抗议，要求把它搬开。1909年，长沙的建筑工人开始袭击学堂，抢夺广东工人承建的怡和、太古商行的仓库。1910年3月，泥木工两次向英国领事申请，要求答应由他们建造已经设计好了的英国领事馆，休特勒只答应雇请湖南苦力和石工，但不肯雇请熟练泥工。据休特勒记载：“他们不肯作任何妥协，走了，正如我立刻告诉我的书记员的一样，他们是存心捣乱的。”4月5日，休特勒从“某间学堂”接到一个可能发生暴动的警告，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泥匠们在信中恐吓要组织暴动。”^⑮关于这个问题，湘抚岑春蓂在4月17日给清政府的电文中说得很详细：“湘省近年制造洋式学堂房屋，本地泥、木两匠既不谙作法，又必欲把持归该匠承包。上年因鄂匠包有教堂工程，本地匠人曾起冲突，当飭鄂匠赶紧完工即行离湘，始就平静。故建造咨议局屋仍令湘匠包工，在沪、汉另招他匠数人教授，以期合作。近因英国领事拟建新署，湘匠坚欲承包，英领绘图给阅，该匠等不能了然，是以在沪雇广匠包建，仍间用湘人，并许湘匠入看学习。该匠等不遂所欲，曾据具禀，当经明晰批示开导，飭地方官责令各匠头约束众工，不准滋生事端。现查扰乱之徒多有泥木两项匠人在内。”^⑯很明显，泥木工匠在暴动中起了带头作用。

三

长沙“抢米”风潮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力量是会党队伍，

这支队伍大体上由三部分人组成。

首先是“青兵”。“青兵”以头裹青巾、身着青衣青裤、动作迅捷而得名。英国驻长领事休特勒对“青兵”的装束有过这样一段形象的描述：“一帮全身着黑的人，披襟敞胸，黑色短上衣，黑色短裤，用白色宽带绑着踝子骨”。^{②⑩}日清汽船长沙事务所的平冈小太郎谈到他见过的“青兵”“动作机敏”。据《抢米风潮日记》4月15日记载：“初更后，各段屋顶忽疾走有声，居民登楼眺望，有匪人头扎青巾，身穿青衣，两手皆持有凶物，吆喝兜拿，竟以未能用武逸去。”^{②⑪}在民间，有人则把“青兵”参加暴动的史事编成“竹枝词”加以咏唱，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青衣‘匪党’撼湘城（一作煽妖风），保护曾无一个兵。口道洋人欺压甚，前街去把教堂焚。”原词下有一段注释：“青衣会党一名青兵，或云为义和拳勇，俱系统、鄂人，二月间来湘观隙，欲代湘人打抱不平，专焚教堂，东牌楼尊道会屋顶上发现青兵一人，青衣青裤，行走如飞。”^{②⑫}岑春煊在一封奏折中说：

“该匪等均着青衣青裤，名曰‘青兵’，于二月来湘观隙而动，适值贫民聚众求减米价，乘机窃发，将省城抚署、教堂烧毁后，分赴各州厅县以图烧堂滋事。”^{②⑬}那么，这支“青兵”队伍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为彻底查清这个问题，日本人曾组织过专门的调查，由参与调查的远藤保雄执笔，写成了一份颇具史料价值的调查报告，其中有云：“两湖铁路工程从山东、河南等地招收了大批无赖之徒，使湖南匪徒的势力一时激增，其党羽以船夫、苦力为中心，包括兵勇、农民、商人，还有少数胥吏、学生加入。现今执其牛耳者为高宗怡、姜守旦、万鹏飞、龚春台等人。”

“白莲在理教之徒作为修造其他铁路的力工，渐渐南下，盐枭之徒由于水路交通工程的频繁，慢慢地将势力扩展到上游，此等匪徒近来有一部分侵入湖南，乘长沙暴动之际，与北清事变的义和团匪着同样服式，他们突然出现在乱民的面前，充当暴乱指挥，

焚烧学堂、衙门、洋馆等。暴动一结束，一溜烟地失去了踪影。有人说这种神出鬼没的人定是非常机敏的地地道道的土匪。最近，在湖南匪徒中间，流行着一种叫做神打的拳法，由于这两种原因，可以断定，白莲在理教之徒混在苦力之中南下的事是无可非议的事实。”^{②④}远藤在这里所说的“白莲在理教之徒”，即指白莲在理教徒，那么，白莲在理教又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呢？据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称：“在理教亦白莲会之支流，蔓延河南、直隶、山东、满洲各地，其教之起在清初，其祖曰杨莱如，字佐臣。”“所谓在理者，言在儒、佛、道三教之理中，奉佛教之法，修道教之行，习儒教之理，其宗旨以正心修身、克己复礼为本，其习俗戒酒而不禁茹荤。谓戒烟酒则其性不乱，身体日健；鲜鱼肥肉所以适口，吾人当修心，不必不修口腹也。不设象，不焚香，多用咒歌偈语。众以其禁烟酒有益习俗也，入者渐多，势以益盛，今满洲马贼多属是教。”^{②⑤}这里所说的“马贼”即宋教仁在满洲所联络者。

必须指出，白莲教与哥老会是有渊源关系的，哥老会发源于乾隆初年四川的咽噜会，到嘉庆、道光年间，由于南方天地会势力的北移，与北方白莲教势力相会合，南会北教之间经过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才形成了哥老会的组织名称。同治、光绪年间，随着湘军的被裁撤，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日增，哥老会始盛，到辛亥革命时期进入鼎盛阶段。正如一位研究中国近代会党史的学者所指出的：“哥老会不是咽噜组织的简单重复，或名称的变异，而是以咽噜为胚型，吸收、融合了天地会白莲教的某些特点，在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定社会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②⑥}因此，作为白莲教一个分支的“白莲在理教”实际上是哥老会的一种原始组织形式。这批以修铁路为掩护而南下的白莲在理教徒是由焦达峰暗中招集拢来的，“焦达峰在宣统年间，曾组织会党成员，分段承包由长沙至易家湾段铁路的接轨工程，利用这个公开

的组合，在杨任等人的帮助下进行了革命的训练和组织工作。焦为掩护其身分，经常赤足草鞋，青衣短裤，手持雨伞，出入于体育社所在的贾太傅祠，权绅们以为他是一个乡巴佬或修筑铁路的工头，对他未加注意，这些修筑铁路的工人（多为会党成员），受了焦的教育，有了一些政治觉悟。”^{②7}从而投入了斗争。

应当承认，南下的筑路工和盐枭中确实有人参加过义和团运动。这从宁乡县令张致安“审理”周财运一案可以得到证明，据该县令禀称：“拿获周财运一名，讯系湖北人，二月间在湘阴县虾蟆港地方，晤山东义和团匪罗蜈蚣，纠邀入夥，该匪等共有二十四人，伊只认得罗蜈蚣，山东人；张侠客，江西人；吴虾蟆，安徽人；孙鸡公、高宝同，湖北人；并胡退三步等六人。”^{②8}

“竹枝词”中也有一首记其事：“蜈蚣肆虐又鸡公，添个虾蟆恶更凶。五‘毒’之中三‘毒’见，预留退步奏朝廷。”^{②9}英领事休特勒认为，从说话的腔调显示，他们“肯定不是长沙本地人”；日副领事也说“有若干名拳匪般的人物参与在内”。这部分义和团余众人数虽少，但能量很大。据《长沙暴动始末报告书》说：“统率各条街道乱民的各仅三、四人，皆青布包头，着青色短衣，赤脚行动，”“语音与长沙土人不同”，他们“左手拿着煤油罐，右手拿着火把或铁棍，到处奔走，若居民请求停止放火，仅以点头应之。”“放火之际，先夺木器摧毁，堆积于一处，灌以煤油，以火把点火，用铁棍散解，火势上升至天井时，突然一溜烟地逃跑了，毫不畏火。”^{③0}从这段描述看来，他们都是一批长期从事反洋教斗争的义和团余众。岑春蓂在致清政府电文中说，“此次匪徒滋闹，系山东义和团匪勾结所致。”^{③1}并不纯粹是“借词恫吓，以邀功赏。”而恰恰反映了南下的筑路工和盐枭中确实有人参加过义和团。正如当时《东方杂志》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湖南省城之乱，除饥民痞匪外，又有团匪余孽矣。”

其次是龚春台领导的洪江会和姜守旦领导的洪福会余部。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员刘道一、魏宗铨和会党首领肖克昌、冯乃古等人均被杀害，无辜群众被害者近万人；但洪江会首领龚春台和洪福会首领姜守旦在会众的掩护下得以逃脱，幸免于难。龚在起义失败后，“潜往长沙”，直至武昌首义发生，南北议和告成，龚才在汉口病逝。至于姜守旦，除个别论著将其列入牺牲者名单之外，几乎所有的原始资料都说他在平江沙铺之役后逃脱，“不知所终”。据前引远藤的调查报告明确地记载着姜还健在；并且，他和龚春台等人在暴动中均处于“执牛耳”的地位。另外，从村山副领事所收集到的一些贴在城门上的揭帖看，其内容与姜守旦在萍浏醴起义中所颁发的《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檄文》几乎完全一致。其中有一张揭帖是这样写的：“白犬金鸡，现同寅可到齐。首但春台，倍千金不改移。有曰青马到头，均夺白巾，各持刀一把，均以杀敌人。比戟本非常，宣统不久长。中华十八省，一概尽姜。水曜月正明，前路无主人。有人或参透，我汉以此兴。”^{③②}这段文字有不少隐语，读起来费解，其大意是：今年秋天，龚春台与姜守旦亲自领导起义，兄弟们都会来参加，大家头裹白巾，各持大刀一把，齐心协力杀敌人。宣统王朝不会久长，十八行省尽归姜守旦所有，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到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大汉王朝兴起的日子。这些说法与萍浏醴起义时姜守旦领导的洪福会众大造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舆论，在斗争中拥戴姜守旦为王，头裹白巾，勇猛杀敌等情何其相似！据宁乡县令禀称：“该痞匪等内多人头扎白巾，称系由省城赶来，变起仓卒，该县兵勇无多，力难堵御，致被滋扰。”^{③③}毫无疑问，这批“头扎白巾”、“由省城赶来”的会众显然是参加过萍浏醴起义的余众。4月22日，查夜委员在长沙市街头“拾获匿名揭帖一纸，称系前年浏醴会匪余党，意图复仇。”^{③④}这就进一步证实，龚春台领导的洪江会和姜守旦领导的

洪福会余部参加了“抢米”风潮。

复次是高宗怡领导的哥老会另一支派洪天保派。在庚子自立军起事、甲辰长沙起事、丙午萍浏醴起义中均未露面的高宗怡，显然是湖南哥老会的一位新的领导者。因为高宗怡的绰号叫洪天保，所以他领导的哥老会一派就叫洪天保派。前引远藤的调查报告把他的名字排在龚春台、姜守旦之前，主要是因为他武术超群。“高宗怡会打一手沅江县产拳法神打。他经常以传授拳术和学艺为名，纠合了一帮流氓，秘密地成立了洪天保哥老会的另一派，亲自指挥。”^⑤毋庸讳言，高宗怡的会众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较小，皇权主义思想特别突出。远藤说高宗怡“穿红缎卦袍，自称是皇帝。”与远藤担负着同样使命的山田胜治专程到沅江等地进行过调查，他有如下记述：“高宗怡著名两湖，拥有数百人，他的队伍称雄四邻，闻名各地，势力凶猛，与封侯不相上下。”并“亲自叫嚷要登上皇位，他的举动遭到了人们的轻蔑和嘲笑。但是有数百人对他的命令是绝对服从，说一不二。”^⑥可见，洪天保派也是参与暴动的会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

湖南自曾国藩的湘军兴起，势力横绝天下，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湘军陆续裁撤，因军功保到武职三品以上的不下数万人，仅湘乡一县，军功二品以上的就有近两千家，这就造成了湖南绅士的势力特别雄厚，这些豪绅多以省城长沙作为据点，营建起自己的安乐窝来，长沙的绅权特大。到清末，在长沙的士绅当中，最有势力的人物首推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杨巩等人。这批豪绅都希望在湖南政坛上找到代言人，使他们能左右湖南政局，保证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看中了与湘抚岑春蓂存在尖锐矛盾的布政使庄赓良。庄乃江苏武进人，历任辰、沅、永、

靖兵备道，以镇压革命党人有功被擢升为布政使，成为位居巡抚之下的第二号人物，在湖南官场混了四十多年，但再也爬不上去，十分觊觎巡抚的宝座。岑春蓂，广西西林人，岑毓英的第五子，乃父曾因镇压回民起义“有功”，官至云贵总督；三兄岑春煊，原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历任两广总督、邮传部尚书等职，岑春蓂“倚父兄势，滥膺封疆。”^{③⑦}其师张之洞又是赫赫有名的体仁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岑春蓂从丙午年起任湖南巡抚，专横暴戾，根本不把下级官吏放在眼里，对屈居其下的藩台庄赓良也是颐指气使，时时刻刻想将庄撤掉，督抚与藩台的矛盾十分尖锐。平时，岑陛见皇上，按清朝惯例，巡抚暂时离任，官印应由布政使护理，可岑偏不将官印交给他，而要另一属员护守；更有甚者，1909年夏，岑春蓂奏劾庄吸食鸦片成瘾，庄因此奉召入京面复，但被免罪开释。庄更加嫉恨岑，两人势如水火。他们之间的尖锐斗争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连外国人也能看得出来。英领事休特勒认为，庄“对巡抚的恶感是人所共知的，这两个人从来就合不来。再有，从巡抚的观点来看，由于这个老头在湖南做官多年，他在大部分绅士中是太得人心了。”^{③⑧}庄赓良决心倒岑，但他深知自己的势力不够，除了结纳豪绅之外，别无选择。因此，庄赓良与士绅一拍即合，很快结成了一个倒岑的集团。这个集团的宗旨在于利用群众暴动，扩大事态，陷岑春蓂于困境，然后逼他下台，以庄赓良取而代之。

激烈的官绅斗争在4月14日召开的席少保祠会议上集中反映出来。这次会议是在群众包围巡抚衙门的紧急情况下召开的。岑春蓂感到事态严重，于14日晨令长沙知府汪凤瀛、善化知县郭中广、长沙知县余屏垣邀集各绅以及城厢各都团总在小瀛洲席少保祠开会。以孔宪教、杨巩为首的顽固派绅士提出合作解围的六项条件：即停办铁路，停办学堂，废警察复保甲、平糶、开皇仓、撤常备军。他们主要是借群众围困巡抚衙门的机会，要挟岑抚停

办一切新政措施。岑春蓂为了得到豪绅的援助，不得不答应各豪绅碓房米店“暂向官仓领谷碾米出售，每谷一石作价三千文，准巢后交款。”席少保祠会议还没有结束，官绅们还在讨价还价的时候，围聚的群众有的已涌进大堂，岑抚令军队开枪，打死二十多人，群众无比愤恨，放火烧毁了巡抚衙门。岑春蓂匆匆将眷属从抚院后门送走，然后携带印信，躲进又一村别院。以王先谦为首的豪绅一方面派人在群众中宣传庄赓良的“德政”，加深群众对庄的好感，拥护庄任巡抚。这批由绅士派出的人员打扮成“饥民”，处处表现出“对于庄公极深爱戴”的样子，“每于来去时辄让道致敬，且皆以‘庄青天’呼之，相戒勿惊犯宪驾。”谓“一经庄公调处必可无事。”③大造由庄赓良做巡抚的舆论。另一方面，又由王先谦领衔，黄自元起草，用七大士绅的名义，打电报给湖广总督瑞澂，要求代奏朝廷撤换岑春蓂，以庄赓良继任。岑春蓂无可奈何，自己已感到无法摆脱危局，“不能不暂从权变，”“借资补救”，“即牌示托病”，于14日下午电奏朝廷，自请治罪，恳请速敕令藩台庄赓良署理巡抚。在奏电中，他对庄赓良及绅士进行攻讦说：“现查扰乱之徒多有泥木两项匠人在内，弁兵开枪后，凶暴如故，惟布政使庄赓良会同绅士出面开导弹压，该痞等虽未即散，尚无十分抗拒……当时详察痞徒不法情形，似专与巡抚为难。”④这段话把官绅之间的明争暗斗暴露无遗。

庄赓良上任伊始，即对群众采取先抚后剿、剿抚并施的策略。为了收买人心，将风潮尽快地平息下去，“庄宪谕飭往观受伤之良民，给伤费四十金，死者给恤金二百金，由府县验明具领，米价减至每升四十文。先由各碓户领谷平巢，一面开仓碾米，派员分途照价采买。”⑤顽固派绅士又唆使一班喽罗扛着写有“众绅公议，平巢伸冤，藩台担保，诸君请退”的高脚牌“游街晓谕”，庄赓良本人乘坐绿呢大轿上街，后面则跟着一群打扮

成“饥民”的狗腿子，高呼“庄青天！庄青天！”据目击者透露，庄也向两边铺房双手打拱，装着温和的姿态笑着说：“开板子！开板子！”但当群众不理睬他这一套，继续把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时候，庄赓良则凶相毕露，伙同帝国主义者共同镇压了这次下层群众的反抗斗争。

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客观上有利于人民群众反对最主要的敌人，对统治阶级内部起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因此，清朝最高统治者对此十分恼怒，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不得不惩处一批“肇衅酿患”的官绅。巡抚岑春蓂、布政使庄赓良、巡警道赖承裕、盐法道朱延熙等均被革职；按察使周儒臣、长沙知府汪凤瀛降三级留任；劣绅王先谦、孔宪教降五级调用；叶德辉、杨巩革去功名，“交地方严加管束”；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也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处罚面之大、处罚之重是空前的。然而，这种官绅斗争毕竟只能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并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因为官绅斗争的目的都是为了各个政治集团的私利，斗争的程度和斗争的方式均受到各自利益的支配，斗争的结局无论是哪一派取胜，对于人民群众来说都是无济于事的。而且，在复杂的斗争中，如果不注意，群众还有可能受统治阶级中某个集团利用的危险，因此，对长沙“抢米”风潮中所出现的官绅斗争的作用不可估价过高。顽固派绅士和布政使庄赓良的联合倒岑固然加速了岑春蓂的垮台；但是，岑春蓂的下台，其终极原因主要还是饥民、泥木工匠、全党等各阶层群众共同斗争的结果。正如当时流传的一首竹枝词所说的，“辕门打破大门开，十丈桅杆倒地栽；斗大关防留不住，轰轰烈烈送藩台！”^④据此可知，布政使庄赓良和顽固派绅士所结成的政治集团决不是这次风潮的动力，而只能是群众斗争胜利果实的抢夺者。

注:

- ① 岑春煊电请军机处代奏稿(1910年4月21日)。
- ② 梁焕奎:《青郊诗存》。
- ③②① 转引自周锡瑞:《改良与革命》,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2页。
- ④ 岑春煊奏湘省澧州等属灾重赈繁现拟提借官钱局银钱钞票以济急需折。
- ⑤ 华容议员刘承孝函送王岳四等以饥荒请赈文。
- ⑥ 金炳辉等以南州灾重赈缺转恳设法救急文。
- ⑦ 安乡邓纯源等请筹水灾善后文。
- ⑧⑩ 澧州谢开运等以灾惨情形乞赈文。
- ⑨ 《长沙日报》1909年11月13日。
- ⑪⑭ 王先谦等三十人致岑春煊禁米出境公呈。
- ⑫ 叶德辉和庄赓良诗。
- ⑬ 王先谦等十余人致岑春煊公函(1910年3月27日)
- ⑮ 《湖南荒象志》,《汇报》2974号。
- ⑯ 王祖歧:《清末帝国主义对湖南的经济侵略》未刊稿,藏湖南省政协文史办公室。
- ⑰④② 刘笃平:《清末长沙抢米风潮始末》,《长沙文史资料》1988年第6期。
- ⑱ 休特勒:《在中国的四十年》,伦敦1943年版,第49—71页。
- ⑲④① 岑春煊致清政府电(4月17日),《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
- ⑳㉑㉒ 《抢米风潮目录》,《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
- ㉓㉔ 长沙“抢米”风潮竹枝词,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第174页。

- ②③②③③ 岑春煊致清政府电（4月20日），《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
- ②④③⑤ 中村义：《辛亥革命之研究》，未来社，1979年日文原版，第191页。
- ②⑤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11页。
- ②⑥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5页。
- ②⑦ 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125页。
- ③⑩ 横山英：《关于一九一〇年长沙暴动史料介绍》，日文原版，影印件。
- ③② 长沙暴动一件（1910年6月3日），（日本外务省文书5—3—2）。
- ③④ 岑春煊致北京军机处电（4月22日），《湘省要电汇录》。
- ③⑥ 山田胜治复命书（1911年2月9日），（外务部文书，1—6—1—4）。
- ③⑦ 尹翎苍：《姜园笔记》，《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
- ③⑧ 休特勒（长沙）致北京公使馆书（1909年7月23日），英国外交部档案228/1726。